

伊万·阿克萨科夫批评话语中的人民性主题

陆 尧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06)

提 要: 伊万·阿克萨科夫是政论家、文学批评家、斯拉夫派核心期刊《罗斯》《日子》的创办者, 青年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之一, 其文化理念的阐发藉由对时代主流作家的批评完成。作为 19 世纪重要的批评主题, 人民性长期以来见诸于斯拉夫派及革命民主派批评家的著作, 围绕这一概念衍生的释义也色彩斑斓。被全俄誉为“民族诗人”的普希金, 也因其作品中深刻的人民性自然而然进入了批评家视野。阿克萨科夫在斯拉夫派美学思想的观照下, 就人民性的含义及其在普希金创作中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成为斯拉夫派普希金观不可获缺的一部分。本文以阿克萨科夫于 1880 年普希金雕塑揭幕式上的讲稿为材料, 在与老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批评家人民性概念横向对比的同时, 探索人民性作为阿克萨科夫批评概念的可能。

关键词: 伊万·阿克萨科夫; 批评话语; 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在 19 世纪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的文学批评中, 人民性¹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直被视作重要的概念, 而斯拉夫派更是把这一概念视为学派理论的核心。当代俄罗斯学者米年科 (Г. Н. Миненко) 指出: “在斯拉夫派看来, 人民与人民性这两个术语极具重要意义, 他们扮演着概念或思想的角色。” (Миненко 2012: 38) 斯拉夫派思想家康·阿克萨科夫 (К. С. Аксаков, 1817—1860) 更是将斯拉夫主义学说等同于人民与人民性的学说。在斯拉夫派文化理论中, 人民性基本等同于民族文化精神内外形式之有机总和, 因此自形成之日起, 斯拉夫派就致力通过唤醒沉睡在文学、哲学等领域的民族精神以寻找人民性。人民性与“聚合性”、文化有机论等理念一样, 不仅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也是斯拉夫派批评家重要的批评概念。由此, 在对老斯拉夫派² 文艺批评反思的基础上, 伊万·阿克萨科夫 (И. С. Аксаков, 1823—1886) 发展出自己的批评体系, 提出了不同于革命民主派及老斯拉夫派关于人民性的看法。通过考量作品外部形式与内核精神两个方面, 批评家以人民性为核心对文本进行了阐释。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 俄国批评界就普希金诗歌中人民性的表现形式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但在此之前, 普希金本人已经阐发了对人民性概念的思考。他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里谈到, 人民性是一个民族特殊的“面貌”, 是该民族思考方式和内在精神的体现, 它显露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中的人民性不仅表现在语言因素与题材考虑上, 还通过环境与宗教展现: “气候、统治方式、信仰, 使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特别的面貌, 这或多或少也反映在诗歌这面镜子里。” (普希金 1997: 36) 人民性是一个民族思考和感知的方式, 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独有的宗教体验和风俗习惯。

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批评家素来以民众代言人著称,人民性是该派在审视作家作品时采用的重要理念。别林斯基称:“诗人在我们今天所能承受的最高的赞美,当代人或者后人现在能够用来尊敬诗人的最响亮的尊号,就是这个字眼:‘民族性的诗人’……”(别林斯基 1980: 161)在这里,批评家着重强调的是作家的民族性,即人民性问题。别林斯基视人民性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作为俄国公认最伟大的民族诗人,普希金因其文本体现的高度人民性成为19世纪俄国最有价值的文学符号。对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来说,若能从自身角度对诗人作品中的人民性概念加以利用和阐释,在日趋紧张的社会舆论环境中,无疑能获得极大的论战优势。

阿克萨科夫也试图将人民性融入到斯拉夫主义理论框架内。他有关人民性的论述主要体现在《60年代文学中的伪人民性》(О лженародност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60-х годов, 1862)、《再谈伪人民性》(Еще о лженародности, 1865)中。他对普希金创作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集中在对普希金诗歌创作形式的分析上,如作者早期创作的《论俄国人民拥有民族文学的可能性》(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им иметь народ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1841)阿克萨科夫在其中探讨了普希金创作中人民性概念的表现问题;其二则聚焦于普希金作品中民族精神的表达,涉及的文章有《论普希金》(Речь о А. С. Пушкине, 1880)。上述文本是阿克萨科夫关于普希金人民性研究最核心的部分。通过这些研究,批评家构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大改革时期前后的政治观点,文学与政治在他身上较好的融为一体,体现了19世纪俄国以文学中心主义³为特征的社会情况。阿克萨科夫固然是以斯拉夫派主要理论家著称,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批评家的政治观点透过文学批评的棱镜投射,是斯拉夫派学者在与革命民主派批评家争夺社会话语权时的文学表现。

赫尔岑曾言:“文学是唯一的讲坛。”(赫尔岑 1962: 58)斯拉夫派与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冲突常以文字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文学成为教育社会、表达诉求、塑造大众精神世界的唯一手段,正如别林斯基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感想和意见》(1846)中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一切精神利益、一切精神生活,以前已经是,今后还将是长久地特别集中在文学中……”(别林斯基 2006: 158)与此同时,受书刊审查制的限制,阿克萨科夫与同时代的多数批评家一样,只能通过文学批评的途径宣扬自己的斯拉夫派理念,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阿克萨科夫文学批评中过于明显的政治色彩导致了沙皇政府的不满;另一方面,作者试图通过东正教信仰完成社会改革的思想也使其在苏联时期备受冷遇。时至今日,当学术界挣脱时代桎梏,文海拾遗,再度客观审视批评家的文学遗产时,阿克萨科夫充满政治意味的文学批评便显露出它的价值,他的普希金研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本文在厘清阿克萨科夫人民性概念的同时,对阿克萨科夫的普希金观进行梳理,以期为后来的普希金研究提供新角度与新思考。

2 人民性批评概念的多维度阐释

对革命民主派与斯拉夫派来说,人民性概念意义各殊。

别林斯基素有“俄国文学批评之父”的称号。鉴于他在俄国文学批评界的巨大声望,其人民性阐释在俄国学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别林斯基确定了人民性作为批评概念的可能,最重要的是,他首次指出了人民性概念中蕴含的民族因素。别林斯基认为,在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中,民族的范围要远远大于人民,对于整个俄国社会阶级而言,人民特指较为底层的阶级,包括农奴。而民族面向的则是世界,它包含了俄国境内从上到下所有的阶级。别林斯基所理解的人民性蕴含了更多的平民意识和民主精神,这和他所提倡的“自然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相一致的。一位作家只有真真切切地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他的作品才有动人的力量和无限的价值。在他的阐释中,“‘民族性’(即人民性——引者注)变成了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作品的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性的最高标准、试金石。”(别林

斯基 1980: 161)

不过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里,人民性的概念却被狭隘化了,它仅仅等同于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民族的文明程度:“民族性(即人民性——引者注)的发展与普遍人性的发展是相互呼应的,只有教育给了它个性化的内容和活动空间……每一个有高度教养的民族却以轮廓分明的个性区别于其他民族。”(车尔尼雪夫斯基 1982: 54)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定论:“没有教养的民族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车尔尼雪夫斯基 1982: 55)在以人民性概念审视普希金诗歌遗产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无非看中了其诗歌所蕴含的教化功用:“他教导读者爱好和尊敬文学……正因为如此,人们公正地把他尊之为第一个真正伟大的俄国诗人……”(车尔尼雪夫斯基 1982: 170)

杜勃罗留波夫进一步完善了革命民主派的人民性理论,他的理论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在他的观念中,文学人民性不仅通过作品中所描述的国家环境与民族语言、风俗表现,更在于作者是否能抛弃阶级意识,融入到底层群众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一分子:“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杜勃罗留波夫 1983: 184)

革命民主派的人民性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这一批评概念随着革命民主派的兴起,逐渐成为区分优劣文学的单一标准,失去美学色彩,进而沦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工具。

相较于别车杜强调人民性中包含的底层意识、民主精神的因素,斯拉夫派把人民性看作社会存在的主要基石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但对人民性概念的锚定却引起该派诸位学者的争论。著名斯拉夫派思想家基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856)曾言:“我们(指斯拉夫派的成员——引者注)之间关于‘人民性’的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人把这个词理解为简单的人民;另一些人理解为在我们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殊性;还有人将它解读为那些留在我们人民生活 and 习俗中的教会制度的痕迹等等。”(Киреевский 1911: 247)老霍米亚科夫的长子德·霍米亚科夫(Д. А. Хомяков, 1841—1918)给出了较为含混的答案,他认为“大量或少量具有共同血统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获得了这些无法确定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却非常容易被察觉,这就产生了一种人民性。”(Хомяков 2011: 270)在他看来,具有诸般特性的人民性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可以被感知却不能被道出实质:“我们只能说,人民性是一种集体的个性,与个人的个性一样清晰,一样不能被定义。”(Хомяков 2011: 270)康·阿克萨科夫和萨马林的人民性概念则较为具体。在前者看来,人民性是由于自然和精神联系而产生的民族特征的整体,或者说是一种“相貌,是民族的整个活生生的人的外表。”(К. С. Аксаков 1992: 303)构成人民性最重要因素是“人民观”,即一种表现在公共生活、语言、习俗、歌曲中的人民自觉意识。萨马林(Ю.Ф. Самарин, 1819—1876)将人民性视作国家科学发展的前提,是科学和科学活动成功发展的条件。他还认为人民性与对真理的认识有关:“我们之所以珍视人民性,是因为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活的真理的开端。”(Самарин 1877: 151)

尽管斯拉夫派的人民性概念比较含糊,缺乏准确的定义,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肯定了人民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阿克萨科夫的人民性受到东正教影响,是一个复合式概念,即人民性是国家、宗教、人民和土地四种元素的有机结合体。在《再谈伪人民性》中阿克萨科夫作出如下定义:“谁保留了自身的人民性因素、俄罗斯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方面的因素和俄国土地的因素,谁就优先成为人民性及信仰的保护者。”(Аксаков 2002: 273)东正教是人民性产生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正教是一种精神历史元素,在它的影响下,俄罗斯的人民性形成并趋于复杂,试图将人民性与东正教分开的所有尝试都是枉然的,某种新的政治化的俄罗斯人民性,是汲取

了东正教全部精髓所创造的。”（Аксаков 2002：748）

阿克萨科夫将人民性视作民族自由独立发展的象征，1859 年获得杂志《帆》（Парус）的经营权时，批评家声明：“我们的旗帜——俄罗斯的人民性，一般来说，人民性是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象征，是生命和自由发展的象征，是权利的象征……！”（Аксаков 2002：273）人民性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认识真理的必然途径之一：“俄罗斯人民性是新起点的保证，是生命最充分的表现，是普遍真理的保证。”（Аксаков 2008：147—148）

阿克萨科夫将革命民主派的人民性称为“伪人民性”（лженародность）：“民主主义和人民性是两个在公众或非公众心目中不断被混淆的概念。同时可以说，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同情俄罗斯人民的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纯粹的西方人，实际上他并不同情俄罗斯老百姓”（Аксаков 2008：184）。阿克萨科夫认为对手以人民性话语解释俄罗斯生活现象的行为，只能给真实的俄国社会涂上虚假的色彩。革命民主派信奉的“伪人民性”是有害的：“伪人民性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真正的人民性，它不仅用谎言来毒害理解，而且毒害感情，毒害单纯、自然、鲜活的爱和对俄国人民性的追求。”（Аксаков 2008：182）

阿克萨科夫的人民性观念与革命民主派泾渭分明，两者就人民性概念在文本中的表现方式也持相左意见。别林斯基派推崇自然主义创作手法，认为对农民不幸生活的直接披露就是对人民性的一种反映，但这种着重描写惨痛现实以此迎合革命呼声的方式遭到了阿克萨科夫的批判，批评家认为，应从多个角度对人民性进行观察，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表现。

在《论普希金》一文中，阿克萨科夫阐释了人民性作为批评话语的多维表现形式：“判别文学中的人民性不是根据表面的特点，比如说，不是仅仅看它是否运用了大众的语言，其内容是否来源于广大群众的生活，最后，也不是看这本书的每一个字能否为农民所理解……恰恰相反，而是因为文学作品中自然铭刻着民族精神的烙印。”（Аксаков 1981：265）一言以蔽之，文学人民性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以单一的方式完整呈现全然不可能。因此基于形式与内容两者的整合统一，阿克萨科夫提出了自己的人民性批评概念。阿克萨科夫批评话语中的普希金研究，是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论述。语言、题材、环境等外在形式与心灵、文化等内部精神互为表里，共同构成阐释普希金人民性的多个维度。

3 语言、题材与环境：人民性的三个外化形式

“语言是人民的一面珍贵旗帜。”（Аксаков 2010：292）在阿克萨科夫之前，霍米亚科夫就认识到了语言对文本充分表达“人民性”原则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语言是“人民性”的一个决定因素：“在持续进行着的世代变换与交替之中，语言可以对下一代人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Хомяков 1900：9）阿克萨科夫将语言视作反映人民性的镜子：“我现在要向你证明，我们的语言是很符合我们性格的。”（Аксаков 2011：181）在《论俄国人民拥有民族文学的可能性》中，批评家论述了文本的语言层面与人民性的关系。他首先谈及俄语的独特性，认为俄语具备的普遍性与一般性是其他语言所缺乏的，俄语之美在于它的包容万象，即语音之广博、词汇之广博。俄语是集结人类一切精神元素的语言，因此母语为俄语者所拥有的兼容并蓄、宽广博爱胸怀，很大一部分是受俄语的影响。批评家认为，俄语语音之广博在于其音调的普适性：“这种语言（俄语——引者注）本身也包含着几乎所有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其他已知和正在形成的语言中都听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学习外语如此容易的原因。它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深刻，多么容易表达各种思想的深浅。”（Аксаков 2011：181）俄语词汇之广是因为它脱胎于斯拉夫语。俄语与斯拉夫语相通，可以从丰沛如泉水的斯拉夫语中汲取新词，并将其同化为自己的语言。俄语反映了俄国人的宽广胸怀，也使得以俄语创作的作品质量远超于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如《莫扎特和沙莱里》《鲍里斯·戈东诺夫》《叶甫盖尼·奥涅金》等，这些作品无一不是用鲜活、纯正的俄语创作的。以拥有广博词库的俄语创作的文学，本身就如同从活水中汲取养分，其外在表现形式永远时尚、新鲜。

在以人民性批评概念审视普希金的文学创作时,阿克萨科夫同样从语言层面对其进行考察。他以普希金诗歌为例,试图证明俄语音韵之美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俄语是有声有色的。拿普希金的任何一首诗来说:多么饱满、圆润的声音啊!我们逐字逐句分析的话,会公正地看到我们语言的优越性。”(Аксаков 2011: 181)在语言声色美感之下,掩藏着普希金文学语言对民族情感的表达:“正是最笨拙和粗俗的语言统治着散文的时候,在诗的形式中,俄语的力量与和谐却开始向俄国听众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在诗歌中,被压抑的俄罗斯情感才能得到满足。”(Аксаков 1981: 266)语言作为文本的外部形式,是阿克萨科夫人民性批评概念的首要维度。在他的批评理论中,使用外语抑或是外语与俄语交杂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无法体现人民性。唯有纯粹的俄语因其声音与词汇之广博,使俄国文学体现出较其他民族文学更为博大、包容的精神特性,传达更细微、更复杂的民族情感。

阿克萨科夫视文学题材为文学人民性的第二个外化形式。在诸多题材中,唯有广大人民以集体智慧所创作的民歌才能体现“人民性”。斯拉夫派对民歌的研究渊源已久。康·阿科萨科夫认为,民间诗歌能够“不断地、自由地、没有外在的阻碍和遮蔽地表达人民的本质。”(К. С. Аксаков 1981: 62—63)俄国学者科舍廖夫(В. А. Кошелев)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表达自己感受与民族性格的诗歌……在其美学观中,民歌是人民独特性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也是人民独特性的最初保障。”(Кошелев 1984: 72)另一学者西蒙诺娃(А. Н. Семенова)指出,“民间诗歌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整个民族……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民间传说、谚语、俗语、民间故事都是人民精神的反映形式。”(Семенова 2001: 55)阿科萨科夫在继承其兄康斯坦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相比于西欧的文学形式,俄国的民间文学尚未被污染破坏,它保留了纯正的形式,而对俄国民间文学题材的援引与再加工,可以充分表现文学作品中俄国人民性特质。

在研究普希金的创作时,阿克萨科夫发现诗人汲取了大量源于民间的素材。诗人的部分创作根植于民歌素材之中,是对俄国民间文学的二次加工:“可以看出,普希金诗歌中‘人民性’在俄罗斯童话和他的一些被称之为‘民间类’的作品中得以表达。”(Аксаков 1981: 271)普希金的一些作品,如《农夫与金鱼的故事》《神父和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均取材自俄国的民间童话,再次展示了民间文学中的人民性。

在青年时期的日记中,阿科萨科夫还论述了环境作为第三种形式得以表达人民性的可能。他主张从俄国的地理风貌考察人民性,因人民性本身就有着相当广泛的存在基础。“俄国‘人民性’,可以这样说,现在仍然扎根于广袤的大地之上,不仅仅是存在于莫斯科,还有圣彼得堡。”(Аксаков 1887: 276—277)当俄国的自然环境进入文本,便成为决定文学人民性的第三个维度。阿克萨科夫认为,俄罗斯复杂多样的气候与地貌为民族文学提供了无限的素材,“在我们的祖国,我们可以找到北方狂野的大自然,还有雪,还有岩石,还有奢华的南方,还有高山,还有蓝色的草原,还有湍急的溪流,一切的一切,你都可以在我们帝国的广袤土地上找到。”(И. С. Аксаков 2011: 183)融入到民族血缘中的俄国大地景色正是俄国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因此,以人民性概念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必须要考察文本中的环境背景以及它对于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

在阿克萨科夫看来,普希金之前的散文与诗歌对人民生活与自然风光的描写都是掺假的,无法体现俄国人民真实的精神特征,除普希金外,“没有人以如此淳朴的真实和深刻的同情描写我们朴实的乡村自然风光。”(Аксаков 1981: 270)而在普希金的诗歌中,“我们不仅看得见,而且能感觉到祖国自然环境生命的思想。”(Аксаков 1981: 272)普希金的作品忠实地再现了俄罗斯的自然环境。《高加索俘虏》中高加索地区巍峨的高山和茂密的丛林,体现了自然野性之美,利于高加索山民豪迈随性、崇尚自由的性格形成;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俄国农村诗意的闲静和农民丰富多彩的活动,切实表达了俄国农村生活的真实景象,俄国农民淳朴虔诚的性格也随环境的展开跃然纸上,迥异于同时代人对法国文学的

仿写，普希金作品中围绕在俄国人民身边的场景生机勃勃且真实可感。

语言、题材及环境是文学人民性的三种外化形式，脱离了三者的人民性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阿克萨科夫也正从这三方面切入，对人民性进行完整把握。以人民性概念对普希金诗歌进行分析时，批评家依循的正是这样一种三元一体原则。

4 民族精神：人民性的内在表现形式

阿克萨科夫认为，存在于民族生活最内核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是人民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没有最高级别的民族精神的自觉活动，那么人民性有很大一部分将不复存在。”（Аксаков 2002：189）文学人民性不仅依靠文本形式体现，还在于文学作品对民族精神的传达。若作者通过文学创作弘扬了民族精神，那么该作品无疑是一部能够反映人民性的著作。

美国学者韦勒克援引了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客观评价：“此前的俄国人没有真正表现民族精神的文学。至少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一向模仿西方文学。”（韦勒克 1991：297）普希金自小学习法文，接受法国文化的教育，甚至还曾有过早期的道德沉沦。诗人因私德问题在老斯拉夫派的价值体系中逊色于果戈理：“老斯拉夫派学者霍米亚科夫……萨马林、基列耶夫斯基所铭记的并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普希金形象，他们亲身了解他，他的道德品质也并非毫无瑕疵。”（Вихрова 1998：67）

阿克萨科夫承认前辈们的观点，即异国文化在这位“民族诗人”的身上留下了不光彩的痕迹。但与老斯拉夫派不同的是，阿克萨科夫认为这种肤浅文化并没有破坏普希金的俄罗斯灵魂，从私德角度指责普希金的民族精神毫无道理。而这一切归功于普希金的保姆，一个地道的俄罗斯民间妇女。她言传身教，以俄罗斯人民崇高的道德与民间智慧哺育了普希金的灵魂：普希金像“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一样，如饥似渴地吮吸人民语言的精神及源泉。”（Аксаков 1981：270）正因如此，地道的俄罗斯精神在他的心中发芽。阿克萨科夫在普希金为保姆所写的诗歌中，看到了诗人对乳母——当时俄国社会最普通的农民，以及她身上源自俄国土壤最淳朴、最原初的民族精神的热爱。正如同斯拉夫派赞同的那样，俄国最宝贵的财富——即真诚、道德、温驯、虔诚等精神品质，都保存在下层人民心中，而“西化了的上层社会由于鄙视下层人民而丧失了‘人民性’，远离了自己的民族精神根基。”（季明举 2015：76）

俄国学者鲍博洛夫斯基（Е. В. Бобровский）曾言：“在斯拉夫派看来，‘人民性’不仅包括在历史命运和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下形成的民族特征，还包括在信仰、民族自觉和国家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特征。”（Бобровский 2015：102）俄国本土的国家结构即是地方区域自治（земство）制度下的村社（община），它通过机构的力量塑造了俄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斯拉夫派对村社制极为推崇，认为它“是在纯粹正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谐社会组织。”（季明举 2015：12）康·阿克萨科夫认为，彼得改革之后，俄国社会被分解为两部分，其一是仍然保留村社生活习惯的人民，其二是失去人民性的上流社会。村社制从深层促进了俄国民族精神——公正的诞生。阿克萨科夫认为，公正的精神“蕴藏在俄罗斯精神的深处”（Аксаков 1981：273）。村社制约了个体性与主观性的增长与发展，是对个体的消弭和对集体的追求，并决定了公正这一备受斯拉夫派推崇的民族精神的形成。

阿克萨科夫在普希金创作中发现了诗人的公正精神，这种精神伴随着对自我形象的压抑、对个人主义的排斥和对客观性的追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隐匿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他对主人公奥涅金不溺爱、不贬斥的塑造方式，对他悲悯而又疏离的态度，恰好符合斯拉夫派推崇的公正与谦卑自抑。普希金“始终真诚、淳朴、自由、从不故作地卖弄自己，也从不讨论自己，即使在描写自己的形象时，他也会选取比他本人更糟糕、更轻浮的形象。”（Аксаков 1981：273）

除公正外，作为民族精神的真诚，同样对作者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阿克萨科夫拒斥功

利性的创作，他认为功利化的文学是对真诚创作精神的亵渎。报以极大真诚创作的文学，都应当是一种无政治倾向的文学，正如普希金的诗歌。

按照别林斯基的看法，普希金创作之所以具有人民性，不是因为诗人的俄国公民身份，而是因为诗人著作中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创作因素。阿克萨科夫的观念与别林斯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普希金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发俄国，乃至全世界的共鸣，是因为诗人本身真诚的风格。普希金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听从内心真诚的呼声，认真对待笔下的人物与自然。诗人“从不标榜自己的诗歌是人民性的，他相当自由和真诚地创作，并毫不掩饰自己俄罗斯灵魂的律动。”（Аксаков 1981: 271）其作品内容是灵感的天然井喷，而非矫揉造作的幻想。阿克萨科夫在普希金诗歌中看到了俄国人民的特质，即对“空洞堆砌辞藻习气的厌恶”（Аксаков 1981: 273）。普希金的作品几乎都是无倾向性的作品，诗人对虚假与浮夸感到厌恶，拒绝在文学中掺杂政治思想：“真诚的本身就是艺术。普希金没有刻意把诗歌变成各种含有偏见的思想和理论的工具，他既不谈政治，也不谈社会。”（Аксаков 1981: 269）忠于现实即忠于内心真实，普希金忠实地描写了真实的自然、真实的俄国和人民面貌，表达了真诚的民族精神，他的作品获得了人民性。

从总体上讲，普希金作品中对真实环境的描写和对人物形象的客观塑造，是诗人作为俄国人民本身真挚诚恳的民族精神的表现，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自古以来，从俄国本土诞生的独特“村社”制度，决定了普希金身上的客观公正性，使普希金在创作过程中保持对自己作品主人公不偏不倚的态度。

5 结束语

伊万·阿克萨科夫出身于俄国最古老的贵族——阿克萨科夫家族。他的父亲谢·阿克萨科夫是赫赫有名的文坛大家，著作等身；他的哥哥康·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奠基人物，理论著述颇丰，但父兄耀眼的光芒并没有掩盖住伊万·阿克萨科夫的身影。1860年之后，斯拉夫派的旗帜实际上已经交到了阿克萨科夫手中，而他不负众望，一直以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身份活跃在俄国文化界，宣扬斯拉夫派的思想。阿克萨科夫在进行出色的社会活动同时，逐步形成以人民性为主的批评概念。批评家视人民性为衡量文学标准的尺度，他以人民性为概念对文本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联合作品语言、题材、环境及民族精神等诸多要素考察人民性的文学活动。

普希金是被命运选中的诗人，他与俄国同胞共同生活成长，与俄国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普希金诗歌中的智慧与洞察力等宝贵的品质，皆是对俄国民族自身优秀品质的反应。普希金的创作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俄罗斯式的感情，源于俄国人民，又能感染俄国人民。作为俄罗斯人民的一员，普希金所表达的一切思想感情都具有民族共性，民族诗人的桂冠他受之无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阿克萨科夫对普希金人民性的强调，并非是批评家视野囿于民族主义的表现。阿克萨科夫在普希金诗歌中看到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人民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他发掘全人类性的必经之路。承认普希金身上的人民性，实际上就是承认普希金身上的全人类共性。斯拉夫派理论认为，人民性，即是某个民族优先发展的全人类性。俄国人民性，就是发端于全人类性，却最终超越全人类性的那一部分精神。诚如阿克萨科夫在讲稿中所提到的：“普希金始终保持艺术家的充分独立与精神自由……他拒斥盲目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他来说，俄罗斯不仅有着斯拉夫的，还有着世界性的、广阔的历史意义。”（Аксаков 1981: 279）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许其意义正在于此。

附注

- 1 在俄语中 народность 既可以被译作人民性，又可以被译作民族性，但两者在概念上存在差别。因伊

万·阿克萨科夫的思想更贴近人民性，故本文采用该说，但在具体论述时会根据需要稍作调整。

2 老斯拉夫派（старш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指的是以霍米亚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基列耶夫斯基（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和康·阿克萨科夫（К.С. Аксаков）为代表的俄国斯拉夫派团体，活跃于 1860 年之前。

3 文学中心主义（литературоцентризм）是一种范式。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文学是文化的核心，一个社会的民族、公民、价值和审美认同都是通过文学形成的。在这一范式中，人们认为文学负责创造、发展社会价值、道德和伦理观念。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文学来讨论并最终得到解决。俄国当代学者别尔克（М. Берг）与康达科夫（И. Кондаков）按照时代标准将俄国文学中心主义划分为若干个部分，两者都认为俄国文学中心主义最为盛行的时期为 19 世纪。

参考文献

- [1] Аксаков И.С. Отчего так нелегко живется в России.[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 [2] Аксаков И.С. Сочинения И. С. Аксакова.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России. статья из «Дня» «Москвы» и «Руси» 1860-1886 (Т.6).[М].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Г. Волчанинова, 1887.
- [3] Аксаков И.С.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им иметь народ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1(2).
- [4] Аксаков И.С. Наше знамя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М].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 [5] Аксаков И.С. Речь о А. С. Пушкине[А]. Аксаков К. С., Аксаков И. С..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С].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1.
- [6] Аксаков К.С.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то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в твор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XVIII–XX вв[М]. СПб.: Наука, 1992.
- [7] Аксаков К.С. Ломоносов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А]. Аксаков К.С., Аксаков И.С..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С].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1.
- [8] Аксаков К.С. Передовые статьи газеты «Молва»[А]. Аксаков К.С., Аксаков И.С.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 [9] Бобровский Е.В. Значение «народности» в концепции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Д]. Контурь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15(4).
- [10] Вихрова Н.Н.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в “пушкинских” речах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Ивана Аксакова[А]. Пушкин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21-24 мая 1998 года[С]. Москва: Кириллица. 1998.
- [11]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ух томах[М].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11.
- [12] Кошелев В.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4.
- [13] Миненко Г.Н. Западные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концепта “народность” в идеологии раннего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Д]. Вестник КемГУКИ, 2012(19).
- [14] Самарин Ю.Ф. Сочинения Ю. Ф. Самарина(Т.1)[М].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А. И. Мамонтова, 1877.
- [15] Семенова А.Н. Исто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духовности (п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 К. С. Аксакова и И. С. Аксакова) [А]. Акса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С]. Уфа. 2001.
- [16]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5) [М]. Моск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0.
- [17] Хомяков Д.А.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ность[М].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1.
- [18] [俄]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М]. 满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19] [俄]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М]. 辛未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0]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一）[М]. 辛未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21] [俄]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М].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22][俄]赫尔岑. 论文学[M]. 辛未艾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 [23]季明举. 斯拉夫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5.
- [24]肖 马, 吴 笛主编. 普希金全集 (第六卷) [M]. 邓学禹、孙蕾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25][美]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三卷) [M]. 杨自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The Theme of Nationality in Ivan Aksakov's Critical Discourse

Lu Yao

(Suchow University, Suchow 215006, China)

Abstract: Ivan Aksakov, as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ritic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ore Slavic periodicals named *Rus* and *Day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Young Slavophiles whose cultural philosophy was elaborated on criticism of the mainstream writers of the times. As an important critical them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ationality has long been presented in the works of Slavic and revolutionary-democratic critics, and there ar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concept. Pushkin, known throughout Russia as the "national poet", also naturally entered the critic's mind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nationality in his work. In the light of Slavic aesthetic thought, Aksakov puts forward his own views on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ty and its expression in Pushkin's works, forming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lavic view of Pushkin. Analyzing the text of Aksakov's lecture at the unveiling of Pushkin's sculpture by 188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nationality as the Aksakov's critical concept while comparing it with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of the old Slavic and revolutionary-democratic critics.

Key words: Ivan Aksakov; critical discourse; nationality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导报〉研究 (1856—1906) 》(编号 20AWW00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陆尧 (1993—), 男,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1-07-13

[责任编辑: 刘 锟]